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与中国式现代化叙事

郑永年

摘 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知识界义不容辞的时代重任。当前，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神话已被打破。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中国在探索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确立了文明本体自信，这体现了现代化是全球不同文明共同探索“多元现代性”的过程。“开源”是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的重要面向之一。面对国际霸权体系的外部挤压，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兼顾发展与独立、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全球南方国家摆脱路径依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范式。中国式现代化造就了今天强盛的中国，同时，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鲜明特质为提炼“开源的中国式现代化”标识性概念奠定了现实基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多元现代性；开源

作 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教授（深圳 518172）。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吹响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①的前进号角。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开启了新征程。

从世界经验来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全面推进，更需要抓住几个核心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其中之一便是关于国家政治经济体系如何运转的自主知识体系。现代化研究是西方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核心，也是其软实力的基础。重大技术进步是现代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78页。
②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1版。

化进程的原初推动力，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塑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实现现代化转型。就西方的发展经验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日后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和知识的源泉，而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则开启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之后，随着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如今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西方学界围绕着由现代化促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进行研究，形成和发展了人们当下所见到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①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知识界的时代责任。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总结了此前西方式现代化及其各种变种的惨痛教训，而且结合了中华文明特有的发展理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成为世界现代化的新范式。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替代，而是对其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不仅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向世界的知识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的重要面向之一在于“开源”，^② 它呈现三个主要特征。其一，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其二，中国致力于弘扬利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推动世界各国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其三，中国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支持各国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本文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讨论继续基于“开源”范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策略选择及其现实意义。

一 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与“开源”

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③ 这一科学概念。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容。^④ 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从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动力。^⑤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ed.),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5.

② 郑永年：《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关键在于“开源”》，《人民日报》2026 年 3 月 18 日，第 17 版。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483 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 18—23 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1—47 页。

“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是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提出的。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① 从 2035 年到 21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② 2023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要求。^③ 2026 年 3 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中国要在 2035 年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④

尽管中国式现代化指向中国自身的发展，但鉴于当今时代背景与国际局势，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今世界危机呈现出多种形式，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在于西方式现代化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世界范围内对“何谓现代性”的认同危机。不可否认，西方式现代化曾深刻影响近代世界的国际秩序、基本格局、经济体系和发展路径。如今，西方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球相对优势逐步弱化。西方式现代化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不再认同和接受西方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必须置于当前的国际大背景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发生在封闭的环境中，而是发生在高度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在现存国际环境下对发展模式的自主、理性选择，也必然对外部环境产生深刻影响。从世界现代化的演进脉络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了全新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既要包括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自身的意义，也要包括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以工业革命为肇始的现代化率先发轫于西方，但西方式现代化如今已辉煌不再。尽管西方的科技和经济在继续发展，但社会治理领域面临严峻挑战。^⑤ 西方国家无法很好地回答现代化下一步怎么走的

①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 23、24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年，第 70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 年，第 7 页。

⑤ 福山深刻剖析了当代美国及西方制度的衰退，他指出尽管经济和科技在发展，但西方的国家能力在下降，政治制度被利益集团俘获，社会治理陷入僵局（即“否决制政治”）。参见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p. 488—505. 哈贝马斯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能保持经济系统和科技系统的运作，但社会文化与政治行政系统无法提供足够的意义和动机，从而必然面临严重的社会治理与认同危机。参见 Jü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pp. 68—92.

问题。^① 近代以来，中国在探寻现代化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但如今已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应当厘清三个关键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取得巨大成就？与之相对，西方式现代化为何陷入重重危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如何汲取西方式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以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达成两者的统一，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是在高度开放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可以将“开源”概念引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中。

在技术发展领域，“开源”是一种开放共享的生产模式，即技术设计公开可见，任何人都能修改、完善和分享。这个术语起源于软件开发环境，表示软件符合某些自由发布标准。如今，它指向一种强调信息自由共享、快速试验和协作创新的理念，即任何人都能贡献想法、改进技术、推动迭代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围绕三个基本点展开。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有“源”的，“源”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内涵。第二，中国以开放的心态和实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选择，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成就的。第三，其他国家在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时，重在汲取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实践智慧，并据此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历史上的西方现代化进程曾具有较强的开放性，这种特质为各国相互吸纳发展经验、结合自身实际作出调整留出了空间，而今这种开放特质已日渐式微。即使在西方，也没有哪两个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一模一样的。但当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现代化模式时，却把其现代化经验固化为一套僵化的意识形态。囿于意识形态的不可修改性，这种现代化的“闭源”模式自然难以适应其他国家的国情。同样，即使是其他国家主动引入现代化，当它们把西方式现代化视为一套固化的意识形态时，也会导向同样的结局。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在主体、思想和实践三个层面皆有体现。在主体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把“中国”而非“现代化”作为主体，强调的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而非把现代化加于中国之上。在思想层面，中国把现代化视为经验，而非固化

① 贝克指出，经典的西方式工业现代化的成功反而生产出了它自身无法控制的系统性风险（如生态危机、制度失效等），西方陷入了无法用旧思维解决新问题的困境，急需一种未知的“第二套”现代化方案。参见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 by Mark Ritte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p. 9—14. 艾森斯塔特指出，西方式现代化已陷入难以自拔的结构性矛盾，下一步的现代化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全球不同文明共同探索“多元现代性”的过程。参见 S.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vol. 129, no. 1, 2000, pp. 1—29.

的意识形态。^① 在实践层面，中国以开放姿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同时坚守自身主体性与独立性，结合本国国情进行调整。

“开源”是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的重要面向之一。中国吸取西方式现代化“闭源”的教训，不将现代化视为单一固定模式，不输出、不强加自身模式，为世界提供可参照、可适配的发展经验，是推动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的现代化范式。

二 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国际经验

近代以来，国际竞争的主轴就是国家间现代化程度的比拼。因为现代化程度不同，各国国力强弱急剧分化。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大多逐步形成强权力量，现代化发展滞后或转型失败的国家，则普遍沦为强权霸凌与外部压迫的受害者。近代工业现代化的思想与实践率先发轫于西欧，实践层面的成功促成了西方诸国的强大，而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也是西方式现代化的产物。在理论层面，这种现象最显著地反映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上，即“适者生存”。不少西方思想家把各国现代化成功与否归因于种族、宗教、文明等要素。如果成功，就意味着某国在上述方面的优质和优越，反之则意味着它在这些方面的劣质和劣等。近期再度流行的西方外交名言——“不在餐桌旁，便在菜单上”，其思想内核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脉相承。

没有国家想成为失败者。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对很多国家来说，现代化是一场充满艰辛的探索。近代意义上的工业现代化进程率先在西欧兴起，并逐步向欧洲其他地区、北美及世界范围扩展，形成具有广泛影响的现代化浪潮。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被西方定义，现代化的前途也由西方决定。对西方来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就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的简单复制。

现代化原本只是各国的经验。即使在西方，人们也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现代化模式。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但当英国向其他西欧国家推广其工业化经验的时候，德国的李斯特质疑了英国所推销的自由贸易模式，转而研究美国汉密尔顿提倡的重商主义模式。^② 西方的现代化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包括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政治体系更加包容、教育普及、科技进步等。但是，在所有这些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复制另一个国家，所有国家都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找到呈现这

^① 郑永年：《现代化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发展经验》，《解放日报》2025年1月7日，第11版。

^②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3—174页。

些“特征”的路径。因此，即使在西方诸国，现代化路径也不尽相同，各种现代化经验在西方的社会科学文献中均有所反映。概括地说，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主要是对西方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与升华。

不过，当西方开始向非西方国家输出现代化经验时，便复刻了历史上传教士传播教义的行为模式，原本的发展经验传播很快就演变成意识形态输出。现代化从西方向非西方扩散的过程，也是西方价值观对外渗透与推广的过程，最典型的便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究其原因，既有理念层面的动因，也有利益层面的考量。从理念层面看，很多西方人真诚信奉西方现代化实践所依托的价值体系，认为只要其他国家照搬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便能复刻西方的发展成就。从利益层面看，西方此举旨在维护自身的先发优势，进而制约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换言之，西方在率先实现现代化之后，便抽走了通向现代化的“梯子”，以遏制其他国家实现赶超。

在漫长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立足自身禀赋、制度基础、国际环境等因素，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探索。英国、美国、日本、苏联以及拉美地区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样本，其现代化探索蕴含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深刻的历史教训。梳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历程与特点，既有助于把握现代化的多元实践形态，又有助于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对以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超越。

英国是全球首个迈入现代化的国家。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率先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依托纺织、煤炭、钢铁、机械制造、航运、金融等优势产业，成为近代“世界工厂”与全球贸易中心。但英国现代化长期伴随着殖民扩张、资源掠夺、社会阶层分化等弊病。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的创新活力明显衰退，工业龙头地位被美国取代。二战结束后，英国国有化改革与福利制度渐显弊端，相对衰落态势日渐明显。英国的现代化实践为西方国家提供了重要镜鉴。美国脱胎于英国殖民地，与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渊源深厚。英国的先行经验为美国提供了重要参照，使其现代化转型所面临的制度阻力远低于英国；但受国情差异制约，美国无法直接复刻英国的现代化路径。联邦制、总统制与三权分立体制的确立，为美国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基础。19 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先后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机遇，快速提升其现代化水平，并长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但与此同时，霸权主义、贫富分化、种族矛盾、环境污染等问题也相伴而生。

相较于英美等先发国家，日本的现代化则具有更明显的后发外生性。明治维新后，日本主动学习西方，推进制度改革、工业化、教育普及和军事建设，迅速成为亚洲工业强国。然而，日本的综合国力快速崛起，这助推其国内军国主义泛滥，最终导致其走上对外扩张、侵略四邻的道路。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和平宪法》的框

架下重启现代化建设进程，其发展模式呈现出较强的外部依赖性，突出表现为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依附美国，在经济领域长期依赖美国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扶持。这种依附美国的发展格局在推动日本深度融入西方市场体系、分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从根源上制约了其发展独立性，压缩了其战略自主空间。受这一依附关系约束，即便在经济、技术等非安全领域，一旦发展态势被视作对美国主导地位构成潜在挑战，日本就极易遭到美国的刻意打压。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日经济竞争日趋白热化，美国通过构筑贸易壁垒、实施金融干预、出台针对性产业规制等方式干预日本的发展进程，迫使日本屈从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这也成为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总体而言，英、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在本质上服从于资本增殖逻辑，其发展进程伴随着资本的扩张冲动与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在制度约束缺位的阶段，资本无序扩张、劳动异化等问题尤为突出。

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是后发国家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实践。十月革命前，俄国虽已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整体上仍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及后续的苏联将现代化目标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框架，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电气化。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苏联依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五年计划”集中力量推进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短时期内完成了从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型，并在航空、原子能、化学、医学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但是，苏联的现代化模式也存在明显局限。例如，苏联长期片面推行重工业优先的方针，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造成大量资源浪费，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偏低；^① 长期过分突出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发展，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未能处理好集中力量加快国家工业化与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关系；^② 高度集中的体制机制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作用，无法及时把握科技发展和市场变化，导致苏联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以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失之交臂。^③ 尽管苏联曾尝试进行多次改革，但这些改革或过于急促，或力度不足，直至放弃马列主义指导思想和苏共的领导地位，从根本上削弱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拉丁美洲（以下简称“拉美”）地区是现代化的“实验室”，先后推行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类现代化战略，更迭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的出口导向三种发展模式。拉美地区曾长期受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独立后的拉美国家虽不属于典型西方国家，但其发展历程深受西方影响。学界常以“依附

①②③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编写组编著：《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 年，第 126、127、192 页。

性”或“依附发展”定义其现代化路径。^① 20 世纪 30 年代起，尤其是二战结束后，为摆脱对外依附困境，拉美各国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该战略初期有效推动本土工业化建设，但长期积累大量结构性矛盾，逐渐引发经济停滞与社会动荡。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主要拉美国家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有效推动了其现代化进程，但 20 世纪 80 年代债务危机爆发。此后，拉美各国纷纷转向私有化、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化，但转型并未破解深层发展难题，周期性金融危机、高失业率、贫富分化、外债压力等问题长期存在。究其根源，拉美始终未能培育成熟的内生发展能力，发展自主性严重不足，长期沦为欧美意识形态与发展模式的试验场。例如，从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到当代阿根廷，其奉行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均源自欧美思潮。外来发展理念落地后适配性不足、流于片面，而拉美本土始终未能形成独立、成熟的发展思想体系。

三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内涵与路径认知模糊。自晚清到民国，相关争论不断，观点横跨“中国优越论”^② 和“全盘西化论”^③ 两端。这一探索历程充满曲折，虽未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但为后续的现代化建设积累了重要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为巩固国家独立、保障国家安全，中国作出“一边倒”的重大外交战略抉择。同时，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开展工业化建设。此前，社会主义国家一般照搬苏联模式和经验，中国共产党也提出过“学习苏联”的口号，但是在实践中发现苏联模式和经验与中国国情有较大差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积极探索。^④ 同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苏联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坚决顶住

① Fernando H.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trans. by Marjory M. Urquidí,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xxi—xxii, 14—17.

② 参见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Vol. 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59—78.

③ 参见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pp. 26—103.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 年，第 71 页。

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①

中国没有亦步亦趋地走苏联式现代化道路，其核心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自主的中国政党。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指出：“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② 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发展壮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具有同样的逻辑。

摆脱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束缚，深刻影响了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方向。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③ 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全面展开，中国既实现了长足发展，又始终坚持独立自主。

为什么中国能够同时实现发展和独立两个目标？这可以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论述来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④ 这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至少包括三层含义。第一，人是现代化的主体，现代化必须回应人的需求，否则现代化便不具有任何意义。第二，超大人口规模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难度远高于西方国家。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关键领导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对一些西方国家“富而不公”现代化模式的超越。“富而不公”既不符合人类的公平价值，也很难促成可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发展中促进社会公平与共享，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同富裕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模式。西方式的精神危机是多数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希望避免的。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既追求经济发展，也重视精神文明建

① 《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编著：《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19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1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9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18—19页。

设，力求避免物质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最终实现全面进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现代化模式。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中国式现代化避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将生态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实现发展与环保双赢。“先污染、后治理”与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长期诉求相悖。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对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式现代化的规避。西方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亚非拉国家沦落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与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普遍采用殖民扩张的历史路径不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在实现自身进步的同时推动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深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中，“民惟邦本”“天下为公”“富润屋，德润身”“天人合一”“和为贵”等传统智慧皆蕴含其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包括了现代化的三个主要层面，即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物质现代化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多数人都有分享物质现代化成果的追求。“共同富裕”的“富裕”首先指的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没有物质现代化，其他层面的现代化便会虚无缥缈、无所依托。同时，相较于其他层面的现代化，世界各国最易就物质现代化达成共识。究其原因，物质现代化的核心在于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的衡量标准较为客观。

制度现代化是连接物质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桥梁”。二战以来，学界越来越倾向于把制度要素置于现代化的核心位置。^① 从制度范畴保障现代化建设需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制度能够保障实现物质现代化，二是制度能够保障实现人的现代化，三是制度能够协调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第三方面最为重要，但也容易被忽视。如果物质现代化实现了，但人的现代化没有实现，即物质现代化没有反映到现代化的主体上，那么现代化就毫无意义；如果人的现代化过于超前，物质现代化

① 二战结束后，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拥有了物质援助后依然陷入发展停滞甚至动荡，学术界开始反思纯粹的物质资本积累理论，转而将“制度”作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核心解释变量。亨廷顿提出，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政治制度化，脆弱的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最大阻碍。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8. 将“制度”从被动适应物质条件的因变量提升为决定经济绩效和国家兴衰的自变量，是新制度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贡献。诺斯曾系统论证制度如何塑造了不同社会的长期经济演进。参见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10. 林毅夫将物质基础（要素禀赋）与制度结构的内生演进结合起来，并强调企业和政府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参见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1—18 页。

没有跟上，那么反过来也会影响由人组成的社会整体。制度的意义在于推动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集中展现了中国

在多领域推进制度现代化所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① 易言之，“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②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意向等由传统状态向现代状态转型。人是现代化的目的。物质现代化旨在筑牢民生根基，帮助民众摆脱贫困处境、营造安全的居住环境、创造便利的生活条件，其核心是保障人的生存权。同时，人也是现代化的标尺。民众能否享有现代社会所赋予的各项权利，是衡量制度现代化的“人本标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实现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也必然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内生动力。

四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互为条件、互相强化：没有对内改革，就不会有对外开放；没有对外开放，也难有对内改革的动力；改革与开放相结合进一步激发了创新。这便形成一种现代化的“开源”模式：以开放促进改革，以创新落实改革；以开放联通世界，以创新开拓未来。

开放是开源的前提。在封闭状态下，要素很难流动，犹如一潭死水。正是因为开放，中国得以有效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认清和利用外部优势，产生了推进现代化的巨大动力，并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开放方面，相较于大部分国家，中国拥有更加丰富的经验。

回望历史，近代中国曾在遭受西方列强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开放。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之下，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列强强迫中国开放的本质目的，是压制、奴役中国，企图将中国变为附庸与殖民地。在被动开放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中国的转型之路步履维艰、充满曲折。1978 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步入了主动开放的历史进程。从此，中国立足自身发展诉求，主动融入世界，并在主动对接全球发展潮流的过程中牢牢掌握发展自主权，顺应世界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

当下，全球格局深刻重塑，逆全球化思潮蔓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国家背离自由贸易准则，持续炒作反全球化议题。在逆全球化明显抬头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594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 432 页。

国际科技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无论是立足本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持续推动全球化进程、重塑世界经济秩序，今天的中国都需要为对外开放注入全新的时代意涵。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对外开放已迈入全新的高水平发展阶段，呈现两大鲜明特征：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二是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

制度型开放聚焦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国际接轨。从前，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系统性地修订和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当下，中国既是国际规则的践行者，也是全球规则体系建构的重要参与方。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是不涉及他方的自主选择，不附加对等条件，具有很强的主动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不是无原则的开放，而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主动作出的开放决策，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开放试点，循序渐进、由点及面、逐步推广。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际，西方部分国家推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全球普惠型开放受阻。西方主导的开放模式以资本扩张、利己优先为导向，难以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则主动肩负起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国担当，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的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之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扩大自主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①除了单方面免签政策取得积极成效外，国家还出台了其他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政策，包括允许部分城市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电信业扩大开放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②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是中国携手各国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当前，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中国的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显得尤为重要，并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各国企业与产品均希望在广袤的中国市场中拓展业务空间，共享中国市场开放发展的红利。中国坚持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有效化解零和思维、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推动全球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优质资源更好聚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要关注开放格局下的经济交流，更应纳入深层次的战略考量。推进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率先主动开放部分具有吸引力的经济活动领域，有利于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交融格局。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 25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年，第 19 页。

五 中国式现代化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性交汇

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发展，但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核心则是人们的共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低估其对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尽管国际舆论普遍聚焦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工智能行业的关键竞争主要发生于美国企业内部，而非中美两国企业之间。“深度求索”（DeepSeek）等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入局，重塑了这一竞争格局，受到全球科技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前三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技术主要是人类使用的工具，而人工智能则具有反向影响乃至重塑人类社会的巨大潜力。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关乎生产力提升和生产效率改进，更关乎人类未来的发展走向。如果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不希望在这一进程中被外部力量规训和裹挟，就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掌握发展主动权、赢得发展优势。

从地理空间演进来看，历次工业革命在技术起源阶段均呈现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但其主导格局在不同阶段存在差异：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英国为核心，第二次工业革命则由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多中心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由美国主导，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展至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总体而言，技术创新长期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并呈现由核心向外围逐步扩散的趋势。在当前人工智能浪潮中，全球创新格局进一步向少数国家集中，形成中美领跑的格局。在国家内部，人工智能产业同样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在美国，人工智能产业主要集中于以加州硅谷和西雅图为代表的西海岸科技走廊，以及由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构成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走廊；同时，奥斯汀等城市作为新兴科技节点正在快速崛起。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形成多极集聚的发展格局，主要表现为三大核心增长极：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在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长三角地区依托完善的产业体系与城市群协同优势，在技术转化与产业应用方面表现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则凭借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与数字经济生态，在人工智能的工程化应用与终端市场拓展方面具备显著优势。

当前，中国的市场活力不断提升，监管体系日益完善，为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发展创造了积极条件。不过，在部分新兴产业领域，监管适配性与创新转化效率仍有优化空间。生物医药领域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问题。当前，中国医药产业已告别以仿制药为主的发展模式，稳步迈进自主原创研发的全新阶段。然而，部分自主研发的新药因监管问题未能及时落地，从而使中国仍需以较高成本进口相关药品，造成创新成果与市场收益脱节。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仅依赖于人才集聚、政策支持和优质营商环境，也依赖于科学合理的监管体系。监管与发展应当相互协调、协同推进，唯有建立在发展基础上的监管，才能既守住规范底线，又激发创新活力。

六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变乱交织，中国有能力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多贡献。我们难以完全把控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能把握的是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前行节奏。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重要。只有自我认知正确，才能把潜力发挥出来，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持续为全球发展与国际合作贡献建设性力量。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实践就是典型案例。可以预见，中国企业的开源反过来会影响西方。西方也会受益于中国的开源政策，对西方自身的技术进行改进。

技术领域的开源逻辑，同样适用于现代化模式。在当代全球发展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参照。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处于西方主导的不合理国际秩序之下。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资源攫取与不平等剥削。在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后，西方国家通过规则壁垒与制度约束抬高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门槛，遏制全球南方国家的追赶式发展，这如同抽掉了它们通往现代化的“梯子”。同时，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构筑技术壁垒，严格限制核心高端技术对外扩散，仅将全球南方国家作为商品倾销与资本输出的主要对象，且时常将经贸往来与人权等政治性议题挂钩，附加非经济类约束条件。

中国有责任总结好中国式现代化既发展又独立的经验，向全球南方提供可资借鉴的发展理念和道路选择。这种经验的传播应当是开源式的，其他国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适配。中国鼓励其他国家依据自身的经验确立现代化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赖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协同推进。

〔责任编辑：赵晓航〕